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传播科学, 2026, 14(10), 217-223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6.1410278

Hans汉斯

深度媒介化背景下人工智能生成短剧中“人”的复制与主体性危机研究

万诗琪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3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9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8日

摘　要

在深度媒介化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刻改写了人机关系。机械复制的对象已从艺术品泛化至“人”本身，引发了深层的主体性危机。文章借用本雅明的“灵韵”理论，剖析技术对主体的算法剥离机制，探究个体如何从主动的自我符号化、商品化，走向被数据化并最终成为脱离本源的拟像式复制品。在此基础上，揭示人类主体性边界在内在、关系、存在三个层面的渐次消融。研究借此探究媒介化生存中人工智能与人的主体性博弈，以回应人机共生的议题。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AI短剧，主体性，人机共生

Research on the Reproduction of “Humans” and the Crisis of Subjectivity in AI-Generated Short Dram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 Mediatization

Shiqi Wan

School of Publish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Beijing

Received: September 23, 2026; accepted: October 19,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8, 2026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eep mediatizati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profoundly rewriting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s. The object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has expanded from artworks to

文章引用: 万诗琪. 深度媒介化背景下人工智能生成短剧中“人”的复制与主体性危机研究[J]. 新闻传播科学, 2026, 14(10): 217-223. DOI: 10.12677/jc.2026.1410278

encompass "humans" themselves, triggering a profound crisis of subjectivity. Drawing upon Walter Benjamin's concept of the "aura", this study dissects the algorithmic stripping of the human subject, exploring how individuals transition from active self-symboliza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to being datafied and ultimately becoming simulacral replicas detached from their origins. It further reveals the gradual dissolu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boundaries across internal, relational, and existential dimensions.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issue of human-machine symbiosis by exploring the struggle over subjectivity between AI and humans in mediatized existence.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Short Drama, Subjectivity, Human-Machine Symbios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深度媒介化时代人的危机

媒介化理论关注媒介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在数字时代，媒介深度融入社会的各个组织，乃至于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体系，从单纯作为工具的媒介，过渡到全方位包裹人类生存的存在。赫普将其称之为“深度媒介化”，这个概念的出现标志着媒介化程度的加深和新媒介特征的彰显[1]。深度媒介化具有明显的去中介化特征，社会实践与媒体实践的界限日益模糊，媒介逐渐渗透进人们的生活，改变社会潜在的逻辑[2]。最典型的便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它在短期内快速崛起，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升级和迭代，并快速地形塑世界，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媒介。生成式人工智能衍生于人类智能，二者有着高度相似性，人工智能以其强大功能性，逐渐入侵人类社会改变其内在逻辑，直接将“人机关系”的问题推入大众视野。

在以往，学界关于人机关系的讨论多从“实体本体论”出发，讨论机器的位移给社会带来的变革，如今则转向了“关系本体论”，开始关注智能环境中机器的联结、协同和冲突，讨论对人身体和心灵的重构，学界逐渐形成了以“人机共生”为主流的思潮[3]。不同于电子媒介，生成式人工智能依靠其强大的算力和庞大的语料库实现了对人的复制；具身化智能体则直观展示了机器强大的“拟真”能力。由此，技术批判的焦点已不再是“艺术品被复制”，而是人本身正被数据化、商品化，进而沦为算法的复制品。技术、身体与主体性的问题不断交织，且日趋复杂。在这样的趋势下，技术是否会极致嵌入社会将人类引向后人类时代？这一关于后人类主义世界的伦理困境正逐渐从理论探讨走向现实[4]。AI 短剧对真人演员的大规模替代，正是这一伦理困境从虚构照进现实的直观例证。思考人是否会被机器取代，同样需要思考人是否会被自身的复制品所取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并非简单的技术迭代，而是一场关乎人类主体性的危机。

需要说明的是，“主体性”在不同的哲学谱系中内涵各异，有必要在此先行界定。近代哲学从笛卡尔的“我思”到康德的先验统觉，将主体理解为自我透明、自主立法的认识与行动中心，这种“自由人本主义主体”恰是后人类理论所要批判的对象。马克思则把主体置于社会实践之中，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为分析资本逻辑下的主体异化提供了基础；从黑格尔到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进一步表明，主体须在他者的承认中才能确立[6]。利科的叙事同一性理论强调自我在讲述与修订自身故事的过程中生成[7]；梅洛－庞蒂的具身现象学则将身体视为主体在世存在的根基[8]。本文

将主体性理解为个体在自我叙事、社会承认与身体在场之中生成并承担责任的能力，而非一种先天自足的实体属性，下文对内在、关系、存在三个层面的划分即据此展开。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把握技术复制对独一性的消解，并借助后人类理论讨论主体性重构的可能。

2. 从艺术品的复制到人的复制：技术对主体的算法剥离

2.1. 数字化生存：肉身退场与主动商品化

目前，个体的生存方式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复合技术的介入下，过渡为一种全新的数字化生存方式，个体呈现出生命与技术融合、算法和思维融合、主体与分身融合以及现实和虚拟融合的趋势[9]。由数据搭建起来的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呈现出分离的特征。个体的数字化身份较少受到客观环境与社会环境的限制，能够在多场域之间流转。在这种流动性的生存方式中，人们拥有多重数字身份，可以生存在不同平台；虚拟身份的多重嵌套，使肉身特征在数字世界中逐渐弱化。在虚拟空间，个体会通过虚拟形象的建构来代偿肉身的缺席，这种建构不只是简单的个人信息呈现，而是一种“人设”，是个人对身份主动的符号化呈现。将自己的语言、情感、形象等个人要素进行符号化运作以适应媒介化生存，主动对自己进行商品化以迎合算法逻辑和流量思维。当前，在 AI 短剧产业中，大量影视公司以低至百元的极低价格向群演或素人买断肖像使用权，甚至长视频平台开始建立批量的“AI 艺人库”，正是这一趋势的直观显现。在此过程中，个体主动将自己的劳动力、时间，甚至作为生物学标识的面部特征纳入交换逻辑，将其彻底转化为市场上可买卖、可随意拼贴的数字零部件。

2.2. 机械复制泛化：人成为媒介的供给

深度媒介化带来的不仅是媒介化程度的加深，更是数据化程度的加深。从数据主义的逻辑来看，人的身体和各种行为都可以以数据和编码的方式存在，数据的自由流动本身即成为价值与意义的来源，生命体与非生命体在这一逻辑下并无本质差异，皆可被还原为可处理的信息。人类以身体的自持性为自我界定的原则已被信息技术打破，身体可以被与之同构的其他物质形式的信息数列所复制、取代、编辑与改写[10]。

个体在数字空间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录、存储和分析，成为模型训练的供给。这一数据化过程必然抽离个体所处的具体情境与独特生命经验，只保留可计算、可归类、可复用的特征参数，个性化的生命经验被压缩简化为统计意义上的模式。在此逻辑下，人不仅被当作商品，更被资本降格为无个性、可替换、可量化的物品，其主体性、独特性与内在价值被遮蔽。

AI 复制的不再是人的某次作品或表演，而是直接指向了人本身，包括其风格、声音、逻辑、决策模式乃至思维习惯，都可以被提取、学习并批量再生产。媒介所构建的环境成为人生存的环境，生成式人工智能所生产的东西恰好深度绑定于媒介的虚拟环境之中，依赖媒介环境所创造的条件而存在。机械复制由此泛化，其复制的对象从作品转向了人本身，“此时此地”的独一性也因此从作品延伸到人的层面被进一步削弱。

2.3. 拟像到分身：无主体性生成的深层剥离

人类主体的物质实践具有合目的性，人类发明工具的目的是认识并改造世界。当工具不再需要人类直接参与实践，人类只需改进工具就能解决多数问题[11]。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进化能力和日益强大的功能，越来越多地参与人的物质实践：人类无须面向生产，而是由机器主导生产过程，人类主体则逐渐沦为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要素[11]。人类主体依旧面临物我分化的主体异化危机，然而，人工智能时代所引发的主体性危机深度已经远超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异化。人不仅面临劳动价值被剥夺的商品化困境，还遭

受着变为被复制品剥夺主体性的危机。

商品和复制品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作为商品的劳动者，其主体性虽然遭受资本逻辑的扭曲和压抑，但是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边界依然清晰，劳动者仍然清楚自己是劳动者，并非失去自我指涉的能力。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理论中指出，拟像的危险之处不在于它是对真实的虚假模仿，而在于它逐渐脱离了本源，不再指向任何真实的所指，转而成为一种自我指涉、可无限增殖的符号本身。人的经验、风格、创造力、逻辑被提取特征并学习最终蒸馏为数据，变成可供算法无限复制的要素。近期部分息影多年的知名演员将其特定时期的肖像权授予商业公司，由 AIGC 技术生成数字身份参与影视制作，被提取的真人演员的面部特征与表演风格用以批量生成新内容的演员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它生成的不再是演员曾经有过的某次表演，而是生成了演员从未经历过的情感、从未说过的台词与从未做过的动作，看起来极度逼真，但没有任何真实的生命经验作为支撑。这些被生成的复制品不再指向背后那个真实的个体，而是脱离本源、可以被无限调用、拼接、再生产的符号存在。商品尚且指向一个有边界的劳动者本体，而拟像则连这层指向关系也一并剥离了，这正是深层剥离的实质所在。

即便这些复制品能够模拟出再逼真的语言、表情与互动，它们终究无法真正看见并回应作为独一无二个体存在的人。这是一种无回应的注视，复制品或许能对你的凝视作出反应，却无法以主体的身份真正回应，这种回应的缺失恰恰是主体性被剥离到最深处的体现。

3. 人类主体性边界的渗透消融

3.1. 内在主体性的消融：自我认知与叙事同一性的瓦解

主体性首先建立在我是谁的独特自我认知与连续的生命叙事之上，依赖于我思、我言、我忆的内在统一。AI 对个人文风、逻辑与记忆的高度模拟，使得“我”的表达不再必然源自我的思想，而“我”的记忆也可能被外置、重构甚至虚构。个体不再是自我故事的唯一作者，表达的原创性、记忆的私有性与自传的连续性这些构成内在自我的坚硬边界被穿透。

利科曾提出“叙事同一性”概念，认为自我并非固定实体，而是通过持续讲述、修订自身故事而生成的动态统一体；“我是谁”的答案，正藏在我如何讲述自己之中。这一理论恰恰揭示了 AI 介入自我叙事后的危机：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模仿使用者的语言习惯、逻辑节奏乃至情感表达，“讲述自己”这一本应专属于主体的行为便被外包给算法。个人风格不再是人们独特生命经验的自然流露，而成为可被提取、训练并无限复用的数据特征。在近期的 AI 短剧争议中，多起未经授权抓取素人或博主照片，利用“融脸”技术生成剧中反派角色的侵权案件频发。个体的面容被强行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性格与经历，这意味着个体的叙事同一性被分离。AI 换脸、AI 克隆语音、“数字分身”等应用，以及 AI 短剧中对演员肖像与表演习惯的提取复用同属此类，正是将一个人的形象、声音与表达方式拆解为可编辑、可移植的模块，任何人都可以调用这些模块生成看似是“我”却并非“我”所讲述的内容。当这种认同建构过程被 AI 的模拟与预测所介入甚至替代时，反思的主体便让位于被预测、被生成的对象，自我叙事的连续性因此出现断裂。“我”讲述的故事，可能只是算法基于历史数据推演，而非真正源自内在生命体验的叙事。

3.2. 关系主体性的消融：伦理互动与责任承担的模糊

在与他者的相互承认和道德实践中，人得以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人本身才是情感交流的回应者与自由行动的责任者。这意味着一个人要确立主体性，离不开他者对自己的回应、承认与介入。人工智能的拟人化趋势，使得人机交互中的情感议题备受研究者关注，人机交互中的信任和共情往往是技术想要达到的理想境界，这一诉求同样体现在观众能否对 AI 短剧演员产生情感投入与信任之上[12]。共情能力之所以在人机关系中具有重要价值，就在于人类可以对人工智能形成拟人化的共情，从而以道德的方式对

待机器[13]。但人工智能终究缺乏真正的社会性存在，无法提供马克思意义上那种双向的、具有承认关系的社会联结，人工智能的拟人，终归是模拟出来的共情和陪伴。

当前，人机情感关系正呈现出一种单向度结构，情感的流动只在“人向机器投射情感、机器给予拟真反馈”这一个维度上运转，而缺失了真正双向承认、彼此改变、共同生成意义的维度，这使人陷入单向度的虚假亲密，真实主体间的相遇与互动被消解。此外，人机共情尚处于神经信号的技术性对齐阶段，“生成式情绪”本质上仍是模型和算法雕琢下的“拟真情绪”，是神经信号的技术性对齐，而非具有主体性的情感解读[14]。

正是因为人机之间无法建立起真正的相互承认关系，因此当机器代替人去参与决策和演说时，始终缺少责任主体。人的责任源自其作为社会关系网络中被承认的行动者，而机器的“决策”只是算法运算的结果，无法承担起相互承认关系中的责任角色，导致行为与责任的脱节，道德责任的归属变得模糊，关系中人与人的链条以及行为与责任的链条断裂。

3.3. 存在主体性的消融：具身性与生命有限性的超越

作为一个存在，身体是主体性最底层的锚点，生命的意义以及在场与缺席的界限皆由此而来。在数字时代，人类从“碳基”走向“硅基”、从肉身走向数据、从个体走向账号、从人走向节点[15]。

凯瑟琳·海尔斯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指出，信息在后人类语境中逐渐脱离其物质载体，被当作一种可独立流通、可脱离身体基底而存在的“模式”，身体则退化为信息暂时寄居的容器[16]。生命不再局限于有形的实体，关于“存在”的意义被再次改写，数字永生这类设想才在逻辑上获得了成立的可能。“AI 复活”已成为具体实践，人们利用逝者生前留下的文字、语音、影像资料训练生成模型，使其以聊天机器人或数字人的形式继续“存在”，与生者对话、回应甚至表达情感。数字永生正是基于当前人类科技的合理想象，当肉身退场后生命似乎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演员将肖像与表演数据授权用于 AI 持续生成内容，正是这一逻辑在表演领域的投射。但是从本质上来看，数字永生实现的是信息、数据以及社会联结的永生。其核心并不是人类如何在数字空间得以永生，而是关于生命在媒介中被重塑变成去主体性的符号网络。

4. 逐步走向复归的人类主体性

当今资本市场用 NFT 和虚拟偶像制造的“灵韵重生”假象，本质仍是本雅明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同样，正因 AI 可以无限生成，资本才需要人为地赋予其“膜拜价值”，制造出一种独特性的假象。但是这种将人类主体性被剥夺的危机，恰恰构成了主体性复归的起点。生成式人工智能虽能无缝拟真人类的表情、声音与反馈，甚至制造出一种互动的幻象，但它始终受制于算法迎合的底层逻辑，只能提供一种单向度的虚假互动，当 AI 短剧将这种虚拟表演推向泛滥时，观众终会面临审美与情感疲劳。这种疲劳，本质上是人类在数字拟像中长期缺失真实回应后产生的反弹。

随着人机交互频率提升，就越能清晰地察觉到其中缺失的是人在真实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联结感。人的主体性是在与他者的相互承认中确立的。真实社会的联结，成为了 AI 难以跨越的壁垒。因此，主体性复归的转折，并非依赖于道德呼唤，而更可能发生于人类对真实关系的重新确认之中。正如灵韵的消逝本身包含着解放潜能，当 AIGC 将人当作“复制品”时，它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神话，为重新思考主体性提供了契机。

随着技术日益渗透日常生活，学界呼吁的人机关系范式正逐步由以人为中心转向人机共生，强调摆脱单向控制思维，转而将智能体视为伙伴，追求人与智能体交织融合、协同共进的局面。与此同时，仍需坚持以人为本：人类应主动利用这种“去魅”，正如部分演员开始转向经营不可被复制的个人人格与

观众缘，进而催生出一种面向未来、具有批判性且能够警惕资本算法的“后人类集体主体性”。

5. 结语

深度媒介化从未止步于将媒介塑造为社会运行的隐形基础设施。在数字化生存的图景中，肉身逐渐退场，个体主动将自身的语言、情感与形象符号化、商品化，以适应媒介化生存的逻辑；人的身体与行为被数据化，变成模型训练的养料，机械复制进一步泛化，个体便从有独特价值的主体降格为无个性、可替换的物品。更深一层，当人的经验、风格与创造力被提取、蒸馏为可无限复制的数据要素，人便从商品化的劳动者进一步滑向脱离本源、自我指涉的拟像与复制品，陷入本雅明意义上“灵韵”消逝的终局。

这一异化轨迹最终指向的，是人类主体性边界在内在、关系与存在三个层面上的渗透与消融。自我认知与叙事同一性被 AI 的模拟所穿透；伦理互动中的相互承认让位于单向度的虚假亲密与责任主体的悬空；具身性这一存在的最底层锚点，也在数据化与数字永生的想象中被消解。灵韵的消逝，标志着传统人文主义所珍视的独特个体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本雅明并未在灵韵消逝面前止步于哀悼，而是从中窥见了艺术走向大众、获得政治潜能的可能。AIGC 对人的复制所暴露出的，同样不只是危机，还有资产阶级“精英化独立个体”神话本身的虚妄，这为重新想象一种批判性的“后人类集体主体性”留出了空间。因此，本雅明的媒介经验理论，不是要让我们退回到对灵韵消逝的悲观复古之中，而是督促身处算法重塑感知之中的人，保持清醒的政治防御意识。

然而，依靠个体自觉尚不足以应对上述危机。面对素人肖像被低价买断、演员特征被批量授权等结构性困境，还需借助制度工具：以分层可撤回的授权和集体协商完善数据产权，落实肖像权与声音保护中的单独同意，将算法伦理审查前移至模型训练与商业应用环节，并明确平台的责任主体地位。这些工具须与行业公约相配合，主体性的复归才能获得现实的制度支撑。本文所设想的“后人类集体主体性”，既不是向自主、自足的自由人本主义个体的回归，也不是主体在数据流动中的彻底消散，而是主体性在关系与共同体中重新获得的生成方式。人与智能体确实共同构成媒介化生存环境，但强调价值判断与责任承担的最终归属仍须是人。面对资本通过分散且被动的个体授权批量提取肖像、声音与表演特征，只有借助制度保障、行业公约和集体协商，将使用权、署名权等权利纳入共同监督，主体性才可能得到守护。这一构想与哈拉维的“赛博格”和海尔斯的“后人类”一样，都反对封闭、完整的主体想象，但更强调责任归属及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因此，“后人类”并非对人的告别，而是在技术深度嵌入生活之后，重新追问由谁讲述、由谁承认、由谁负责。本雅明的媒介经验理论也由此成为一种面向算法权力的政治警觉，而非对灵韵消逝的悲观怀旧。

参考文献

[1] 常江, 何仁亿. 安德烈亚斯·赫普: 我们生活在“万物媒介化”的时代——媒介化理论的内涵、方法与前景[J]. 新闻界, 2020(6): 4-11.

[2] 顾烨烨. 深度媒介化: 逻辑起点与形成要素[J]. 新闻爱好者, 2024(4): 93-96.

[3] 赵云泽, 项甜甜. 2025 年智能传播研究综述: 行业变革、人机关系与风险治理[J]. 新媒体与社会, 2026(1): 87-106, 500.

[4] 朱梦梦. 后人类时代的“灵韵”: 论《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复制技术[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3): 144-150.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5.

[6] 阿克塞尔·霍耐特. 为承认而斗争: 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M]. 胡继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66-67.

[7] 保罗·利科. 作为他者的自身[M]. 佘碧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78.

[8]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14-118.

[9] 陈琦, 陈家栋. 从“实域”到“虚境”: 数字化生存中个体生命的自我重构[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5, 47(6): 161-168.

[10] 刘维邦. 身体感知与符号资本: 数字媒介如何参与组建生存[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3, 45(5): 30-36.

[11] 施宇, 郑达威. 从“物我齐一”到“人机交互”: 物化传播视域下元宇宙的主体性研究[J]. 中州学刊, 2023(5): 170-176.

[12] 王哲平, 王子轩. 2025 年中国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研究的十个关键词[J]. 声屏世界, 2026(2): 12-17, 70.

[13] 张丽萍, 张立涛. 对“生成式情绪”的共情实践: 人对 AI 情感智能体的情绪感知与共情[J]. 国际新闻界, 2025, 47(7): 118-139.

[14] 崔中良. 共情作为人机价值对齐基础的哲学探索[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5, 41(4): 73-80, 115.

[15] 王敏芝. 技术化的“我”: 数字生命的价值标定及其实现[J]. 新闻与写作, 2024(11): 24-33.

[16] 施畅. 虚拟现实崛起: 时光机, 抑或致幻剂[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6, 38(6): 95-99.